

清代黄河「复道」与「改道」之争

□ 陈 静

咸丰五年（1855）五六月份，连续暴雨致使河南兰阳县（今兰考县）境内的黄河水位迅速抬高。六月十八日（1855.7.31），铜瓦厢堤坝出现坍塌。两日后，黄河在此处决口并由此改道山东入海，这便是数千年黄河史中的最后一次改道——铜瓦厢改道。黄河改道之后，山东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新黄泛区，而原河道流经的安徽和江苏则自此摆脱黄患影响。如果堵筑铜瓦厢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黄患会再次危及安徽和江苏。对于清廷而言，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重要抉择。所以，围绕黄河“改道”与“复道”问题，清廷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其中，“复道”派始终处于劣势并最终失败告终。

咸丰时期的“无防无治”

铜瓦厢堤坝被冲毁的当日，署河东道总督蒋启扬即上奏决堤之情并着手抢险工作，却不承想仅仅两日之后，汹涌奔腾的黄河水脱离原有河道一股脑儿地涌向山东，淹没摧毁大量房屋、树木和田地。按照惯例，收到蒋启扬第一份奏报的咸丰帝应即刻下诏抚恤受灾地方并要求立即堵筑漫口。但是，随着黄河险情不断升级和堵口工程所需费用的日益明确，咸丰帝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数百年不遇的黄河大改道，黄河堵口工程所需的巨额费用已远远超出清廷财政的承受范围。并且，这一年正值太平天国北伐西征之后的全盛时期，为应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威胁，清廷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倾向军费，并于咸丰三年（1853）设立厘金制度以最大限度地网罗民间资本来补贴军用支出。可以说，在清廷财政捉襟见肘的当口，咸丰帝着实无法筹集到巨额经费用于黄河的堵口工程。所以，七月二十五日（1855.9.6），在铜瓦厢决口一月有余之后，咸丰帝下诏暂行缓堵漫口，要求对改道后的山东黄河段因势利导、设法疏通。只是，因太平天国运动的牵绊和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咸丰帝对黄河提出的“暂缓”政策始终不曾有任何改变，且终其一生未就黄河改道提出治理之策，最终致使黄河处于“无防无治”的状态并侵蚀着新河道流经的河南、直隶和山东地域。

同治时期的河运与海运之争

如果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军事压迫，可以作为咸丰帝暂缓漫口的托词，那么通过洋务运动开启中兴时代的同治一朝则开始主动面对并尝试解决改道后黄河造就的灾难。此时，“复道”派以恢复山东运河之漕运为由再次提出黄河问题。同治七年（1868），黄河在河南荣泽发生决口，进入安徽省境并威胁江苏淮扬一带。面对黄河决口和再次回归故道的可能性，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楨借此时机提出黄河“复道”的主张，并且给出了一个对清廷而言极具诱惑的理由——黄河“复道”可以解除黄河穿运之患，继而重开被黄河泥沙淤积而停运的漕运。维持大运河畅通以保证漕粮的运输，是历代中央王朝的治河重点，尽管此时慈禧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却也不愿意断然放弃对运河的整治和漕运的维系。所以，慈禧派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复道”与漕运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只是，在调查行动开始之前，慈禧太后早已下令进行荣泽决口的堵筑工作。最

终，曾国藩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决口合龙之后才送达慈禧手中。可以想见，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只会有一个——“遽难恢复黄河故道”。

但是，“复道”派的努力并未停止，而慈禧也依旧希望能够寻求河运维系的方式。同治十年（1871），黄河在山东郛城的决口再次为丁宝楨等人要求黄河“复道”提供了契机，而这也由此引发了朝野有关“复道”与漕运维系的一场大辩论。最终，慈禧令李鸿章前往山东勘察。5个月之后，李鸿章上奏称故道既复，河运亦难以恢复。如若失去黄河的水流支持，借黄济运的山东运河单纯依靠沂水和汶水等水系，难以支撑运河漕船的航行。所以，黄河回归故道对运河的治理无甚帮助。而且，经过洋务运动洗礼的李鸿章提出应该由海运代替漕运来完成由南至北的漕粮运输。运河不仅效率低、运费高昂，加之各级官府盘剥和贼患，以及运河疏通的治理费用，漕运已经成为清廷之积弊。所以，清廷应该趁此时机，将办河办漕的财力和精力用于省时省力省财的海运。最终，慈禧决意黄河“改道”山东，而同治朝的争论最终以“改道”派的决胜而告终。

光绪朝堵口浚旧堤与顺河修新堤之争

1875年，年仅5岁的光绪帝登基，此时距离黄河铜瓦厢改道已整20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山东巡抚丁宝楨着手修筑黄河新堤，但终因工程浩大和经费紧张而在修筑一部分后宣告中止，而“复道”亦被慈禧所否决，所以“复道”派只能重新为减少山东黄患灾害寻谋出路。其中，山东籍官员游百川等人提出将黄河水引入山东境内的马颊河、徒骇河等以达到分流黄河水的目的，但因清廷“暂缓开引”被否决。既然已经毫无退路，时任山东巡抚陈士杰开始大规模修筑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大堤，终于光绪十年（1884）竣工。但由于经费短缺和工程难度大等问题，大堤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而山东民众亦对此怨声载道。

为更好地解决山东的黄河水患问题，慈禧选择山西巡抚张曜前往山东勘察。张曜提出分流3/10的黄河水入黄河故道的建议，但这一提议却遭到黄河故道流域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包括两江总督曾国荃和江苏巡抚崧骏等。光绪十二年（1886），张曜就任山东巡抚，在不遗余力地补修山东段黄河大堤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主张分流黄河入故道。在黄河新道与故道各地方官为黄河是否分流争论不休之际，黄河的再一次决口将双方的争论推向了制高点。

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河南郑州段的南岸决口，这一位于铜瓦厢上流的决口将黄河水完全引回黄河故道，而此前铜瓦厢决口改道造成的山东、直隶等地的新河道则完全断流。趁此时机，山东巡抚张曜重提堵筑铜瓦厢决口，让黄河重回故道。面对清廷赋税重地江苏地域的灾民，慈禧没有任何犹豫地要求迅即堵筑郑州决口。至于是否堵筑已经断流的铜瓦厢决口，让黄河“复道”或者“改道”，慈禧派遣礼部尚书李鸿藻前往河南查办决口情形。经过勘察，李鸿藻认为应趁此时机让黄河回归故道。对于这一结论，慈禧的态度是清廷财政无法在堵筑郑州决口的同时，再承受堵筑铜瓦厢决口的费用。接着，慈禧要求曾国荃等人勘察黄河故道，以初步估算修复故道的用度。

最终，曾国荃就黄河宜南或宜北两策，进行了权衡，而其理由主要是为清廷算一笔经济账。此时，黄河已经改道30余年，而山东也已经修筑了官堤，所以黄河“改道”山东并不至于使山东受损。但是，黄河回归故道却有诸多经济上的损害。其一，故道下游流经之江苏是赋税重地，如若受灾，则国家赋税损失严重；其二，官方需要支出一笔巨额费用，以用于铜瓦厢的决口堵筑；其三，“复道”之后，安徽、江苏两省常年淤积和年久失修的旧河道已经难以承受黄河带来的泛滥、决口、淤积等诸多问题，所以必须重新修整旧河道。最终，清廷在堵筑郑州决口之后，并未再提及铜瓦厢决口堵筑之事，而争论30余年之久的黄河“改道”与“复道”就此终结。

回顾历史，咸丰朝，由于战乱和时局动荡，清廷着实无力堵筑铜瓦厢决口，更无心修筑黄河新河道的堤坝；同治朝，饱受灾民之苦的山东地方官以保漕运为由要求黄河“复道”，但是“改道”派却以无论黄河南行或北行皆无益于漕运为由进行反驳，最终清廷放弃漕运，而以海运取代之；光绪朝，山东官员利用郑州决口再次挑起“改道”与“复道”的争论，但是清廷最终因“复道”所需的巨额费用和可能遭受的赋税损失而选择拒绝。所以，与其说黄河“改道”与“复道”的争论以“复道”派的失败而告终，不如说是清廷被动接受了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事实，是在清廷积贫积弱状态下的被迫抉择。



今天怎么研究国学？

□ 郝英明



水、无本之木。

这种创新研究方式聚焦国学源头，先是重点通过主要经典和主要概念，总结归纳了对传统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儒道两家思想精华，并勾勒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概貌；再分篇章以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老子之道、庄子之游、韩非之法、墨子之谦为主旨，建构儒道法墨四家思想体系，既为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国学流变打下了坚实的“溯源”基础。从纵向看，将国学研究溯源于先秦时期，更有拨云见日之效。雅斯贝斯曾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今时代，国学的研究要回到原点，返本溯源，穷究本末，从先秦诸家原始经典中主要是儒道法墨中了解传统文化的真面貌。先秦是原点，离开了原点就是无源之

夏海以先秦儒道法墨为主体，从原点探究国学，立意高远。国学发展历经千年，各家思想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争辩、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国学的思想内涵，促进国学发展演化。从横向看，以儒学为主体，儒法道并存，互为表里，相互影响，构成了国学的主体框架。霸王道杂之、外儒内法，是传统政治的真实写照；孔老并生、儒道互补，是学术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处世原则，这些无不表明儒道法三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从纵向看，将国学研究溯源于先秦时期，更有拨云见日之效。雅斯贝斯曾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今时代，国学的研究要回到原点，返本溯源，穷究本末，从先秦诸家原始经典中主要是儒道法墨中了解传统文化的真面貌。先秦是原点，离开了原点就是无源之

夏海的创新研究方式遵循学术性和通俗性相统一的写作理念，秉持一贯的解构建构写作方法，重在阐释义理，在学术与普及之间实现平衡。学术普及是学术传承发展的基础工作，夏海长期从事国学研究，致力于国学普及，在品读经典、研究国学、普及国学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和写作风格，为非专业读者提供了打开国学大门的钥匙。他所写的国学论著给人的感觉是，外行人看了不觉得深，专业研究者看了不觉得浅，讲清楚了为什么学国学，怎样学国学，怎样把国学蕴含的信念、智慧内化于心等基本问题。普及国学并非易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写

学术论文较为容易，因为它有一定的可遵循的写作模式和表达形式，而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需要真正做到研究的深入、方法的创新、文笔的优美。从方法上，夏海注重经典的系统性、解读的现实性和语言的通俗性，他将散见在儒道法墨经典中的观点梳理归纳，建构了以仁为核心，仁、义、礼相辅相成的儒家思想大厦；建构了以道为逻辑预设，本体哲学、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相互映照的道家思想体系；建构了以“法”为前提，法术势三位一体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基础；建构了以“兼爱”为主旨，兼与别相对立，爱与利相结合，体现平民百姓诉求的墨家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的建构，避免了注释体解经对单个词句的孤立理解，有利于读者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儒道法墨思想精髓。由此，读者可以观照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却不拘泥于当下和眼前，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读懂国学的现代诠释。同时，行文流畅、文字典雅，运用诗词、名言、典故等也至关重要，这样可以把原本古涩艰深的国学经典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表述。

夏海的创新研究方式严守原典文本，注重推敲，旁征博

引，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写作精神和宽广的学术视角。他怀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在建构儒道法墨各家思想体系时，始终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以文注文、以人注人，不凭空想象，不随意发挥，不任性议论，大到标题的拟定，小到文字的打磨都凝聚着作者深入的考量。夏海具备西方哲学学术功底，学术视野开阔，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寻找异同。比如，将《韩非子》与《君主论》这两部关于君王统治术的中西名著进行对比分析，帮助读者感悟中西文化的差异，指出绝不能将二者混淆；引用西方哲学家对道家思辨哲学的评价，对比中西哲学传统的差异，指出中国哲学侧重探究“人与人”的关系，以“有知探索未知”方式归纳提炼政治道理和伦理准则，西方哲学侧重探究“人与物”的关系，以“有知验证未知”方式提炼升华科学道理和自然法则。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一个自觉的认识，坚定文化自信。夏海的国学创新研究方式阐发先秦圣贤思想，赋予它以现代的诠释和新的思想内涵，展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魅力和思想智慧，必将惠惠士林，进一步推进国学研究和普及。



汉宣帝中兴与整顿吏治（一）

□ 王志强

百姓，“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官员是为百姓服务的，应该成为百姓的依靠和助力，而不是当一个对百姓疾苦无动于衷、高高在上的木偶人，“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

治理国家的首要在于吏治，“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宣帝一直注意着“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在汉代选举人才的察举制中，汉宣帝特意提出选举的人才要“亲民”“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亲民是宣帝一朝察举制的特色，这对当时的官场风气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汉一朝的循吏以汉宣帝时最多，出现了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一批“所居民富，所去见

思”的循吏，循吏在汉代是干练担当、以民为本的代名词，循吏的大量出现无疑是受到以亲民为核心的察举制的影响。此外，宣帝时的人才也是汉代最多的，史书褒扬道：“汉世良吏，于是为盛。”有可以同汉初名相萧何、曹参媲美的魏相、丙吉，还有治狱有方的廷尉于定国和多谋善断的将军赵充国，文学之士则有享誉后世的刘向、王褒，儒术之士又有萧望之、夏侯胜等人，大批量的能臣干吏表示了当时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地方的民风民俗得到改良，国家的认同力凝聚力得到增强。

汉宣帝还十分重视基层官吏的生活状态。基层官吏直接跟百姓打交道，是百姓认识和了解国家的直接来源。然而基层官吏的事务繁重却俸禄低

微，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清廉则难以养家，贪污则难以安心，这种境地影响着基层官吏服务百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宣帝特意提高基层官吏的俸禄，好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汉宣帝认为禄薄不能养廉，如果官吏尽心职事的所得不足以自存，则他们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最后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

